



群学探索与严复 对近代社会理念的建构

QUNXUE TANSUO YU YANFU DUI JINDAI SHEHUI LINIAN DE JIANGOU

王天根◎著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黄 山 书 社



群学探索与严复 对近代社会理念的建构

QUNXUE TANSUO YU YANFU DUI JINDAI SHEHUI LINIAN DE JIANGOU

王天根◎著

黄山书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群学探索与严复对近代社会理念的建构/王天根著. 合肥:黄山书社,2009.4
ISBN 978-7-5461-0410-2

I. 群… II. 王… III. 严复(1853~1921)—社会学—思想评论 IV. B25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46758 号

群学探索与严复对近代社会理念的建构

王天根 著 责任编辑 王海宏

出版发行:黄山书社

地 址:合肥市政务文化新区圣泉路 1118 号出版传媒广场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合肥锐达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720×1000mm 1/16

印 张:16.25

字 数:320 千字

版 次:2009 年 11 月第 1 版 2009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30.00 元

序

严复研究是近年来学术研究的热点,国内举办一些大大小小的会议专题探讨严复的学术思想,差不多每年一次,尤重严复的科学思想及其在思想启蒙中所作的贡献。天根同志原系广西师范大学中国近现代史方向硕士研究生,毕业后留校,后考入北京师范大学,跟随我研习中国近现代文化史。其博士论文探究严复社会学思想,在思想与社会互动的框架中探讨严复群学(即社会学)著译,重在比勘严复译著与原著文本的不同,充分发挥了自己原来就读英语专业的一些长处。近年来该同志发表了一批学术论文及著作,尤其是《天演论》的探讨,有一定学术反响。

随着严复思想研究的整体推进,严复社会学思想的研究取得初步成果,也存在一些问题,主要是严复社会学思想发展轨迹是怎样的,前期与后期有无变化,与同时代人相比,有何异同及其原委,仍属薄弱环节。研究视野也有待拓展。以往研究者多关注严复社会学思想是什么,而结合严复对西方社会学著作的翻译、诠释与裁剪,从社会变革层面上探讨严复社会学思想的嬗变与社会转型的关系,以及知识界就严复对近代社会理念的评判与抉择,很少涉及。天根的探索恰恰从这些方面展开。

天根认为,作为思想家、翻译家的严复,研究他的社会学思想可从社会与思想、翻译与思想的互动中考察。天根论述按以下逻辑层次展开:

首先,在社会与思想互动中审视严复社会学思想嬗变之轨迹,有利于研究者探究近代学术与社会转型之间的关系。主要有两个方面。其一、严复社会学思想深受斯宾塞等影响。他坚持社会进化论;主张社会有机体论,有自己的社会学思想应用形态“从物理到政理”及“国民素质论”,并用于解析近代社会,具有较强的实践品格。其二、严复社会学思想深受战争影响。甲午战争中国的战败被国人视作日本学习西方的胜利。他注重从学理层面探究西方的富强,著译介绍达尔文生物进化论、斯宾塞的社会进化论,反对赫胥黎伦理教化。日俄战争中日本的胜利被严复视作君主立宪对君主专制的胜利,中国要搞君主立宪。严复藉评点老子将西方社会进化论与老子“道法自然”思想结合起来,意在为立宪奠定学理。第一次世界大

战前后,列强侵略给落后国家带来残酷现实;众多侵略者一旦自身势力均衡被打破,世界大战便写进人类历史。这在严复的思想中明晰地反映出来:渴望富强的他仍推崇君主立宪制。面对西方伦理危机,他日益趋向重伦理的儒学。针对如何走出专制王朝藩篱的“历史循环论”,严复认为:理想的社会建构是君主立宪制与儒家伦理并存而又剥离。

其次,在翻译与思想互动中剖析严复社会学的构建。天根以《天演论》、《政治讲义》、《群己权界论》、《群学肄言》和《社会通论》等与社会学密切相关的译著为中心,进行中、英文比勘,从而把握译作与原著的距离,原著所表达的社会学思想对译者的影响,译者自己固有的社会学思想如何投影到其译作中,进而深层次地探讨因作者与译者文化背景的差异,导致两者社会学思想之间的对话与交流如何在译作中得以体现,以展示严复译著的宗旨,即对学理的追求,对现实政治的关注。

天根注重纵向剖析,还将与严复有类似经历,诸如翻译介绍西方社会学著作并致力解决中国现实问题及清理学术遗产的章太炎进行比较。严复与章太炎就引进西方社会学著作应具备的翻译水平、因译作传播而形成的价值导向等问题进行商兑、批驳。在早期“西方社会学中国化”历程中,严复对“西方事理”的推崇和章太炎对“本土经验”的强调体现了近代社会学变迁的学术发展态势,严复、章太炎的学理建构路向代表了近代社会学转变历程中的发展态势。他们对传统社会理念羁绊下近代社会学思想的建构与创新,为我们考察中国传统社会理念在近代社会的沿革提供了独特的视角。以往很少有人研究,作者在这一方面进行探索。

通过研究,作者得出的一些结论值得关注。以英文著作及有关严复史料为基础,作者提出:严复认为西方社会学是科学,社会学含括的政治学也是科学,政治学主张的君主立宪制也是“科学”;严复还认为儒家伦理属“非科学”;而理想的社会建构应该在制度上搞西方科学意义上的君主立宪制,在精神上强调儒家伦理,两者的关系是并存,而又不互相干涉。作者结合其时的社会语境,通过中英文本的比勘,指出严复社会学思想反映的问题:严复社会学思想的功利性。严复引进西方社会学时,只要对启迪国人有用,对中国社会有用,便照样搬进来。经过严复数次诠释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也包含西方社会学思想中的几近弱肉强食的游戏规则,便是明显的案例。就是被引进的社会学理论部分,只有那些能解决中国近代社会转型中出现的社会价值失范以及制度危机,才能达到阐发,甚至是斯宾塞也没有意识到自己表述产生的文化意象在严复的社会学思想中得以重建。这又和严复理论立足点,即严复从西方语境中看中国,从半殖民地文化语境中看世界有关。

严复社会学思想是建立在对农耕文明背景下中国荀子、老子、庄子、司马迁等为代表的传统社会思想进行反思、重估,对世界资本主义背景下以斯宾塞、赫胥黎、密尔、甄克思等人为代表的西方社会学思想进行评判、选择的基础上,再加上他所处近代中国属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环境,这和早期西方社会学创始人所面对原创性资本主义迥然有别。因此,其社会学思想中的复杂性,是历史时空本身具有的复杂性、矛盾性的反映。作者的结论有宏观的历史视野。

总体而言,在近代社会理念建构的社会语境中,严复为西方社会学中国化作出杰出的贡献。

以上论及严复社会学思想及其流变,天根在书中都做了详细的阐述和分析。他能广泛搜集原始史料,肯于钻研,客观地对待已有的学术成果,学风是严谨的。天根有较扎实的中国近现代史及传播学学养,希望他继续将两者结合起来,研究严复译著及其传播效果,为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作一些新的探索。

龚书铎

2009年5月20日

内容提要

严复社会学思想研究近年来取得一定成果,也存在问题,主要是研究者多关注严复社会学主张是什么,而结合社会实践探讨其嬗变与社会转型的关系,严复对社会学译著的诠释与裁剪,其社会学思想在早期西方社会学中国化过程中扮演的角色等,鲜有涉及。本书共分三编,旨在对这些方面进行探讨。

第一编从社会与思想互动的角度,剖析严复社会学思想嬗变的过程。严复社会学思想在学理上深受斯宾塞等影响。他坚持社会进化论,主张社会有机体论。严复社会学思想有其应用理论形态,即“从物理到政理”及“国民素质论”,并用于解析中国近代社会,有实践品格。严复社会学思想在实践上深受战争影响。甲午战争中国的战败被严复等视作日本学习西方的胜利。严复注重从学理层面探究西方的富强,著译介绍达尔文、斯宾塞的进化论,反对赫胥黎的伦理思想。日俄战争的结局被严复视作君主立宪制对君主专制的胜利。严复藉评点老子将社会进化论与“道法自然”思想会通。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列强侵略给落后国家带来残酷的现实;众多侵略者一旦自身势力均衡被打破,世界大战便写进人类历史。这在严复的思想中明晰地反映出来:理想的社会建构是君主立宪制与儒家伦理并存而又独立。

第二编从业缘层面,分析严复在近代军政利益集团中扮演有思想之翻译家的文化角色。首先,严复以译著西方学者讲稿为中心,注重发掘牛津大学、剑桥大学高品位的学术讲座及授课讲义涉及的社会学思想或理念。严复译著赫胥黎的讲稿,易名《天演论》,探讨近代生存斗争的社会理念建构;严复译著西莱的讲稿并命名《政治讲义》,从社会学层面探讨政治。其次,以《群己权界论》、《群学肄言》和《社会通论》等代表性著作为中心,探讨严复对个人与社会关系的界定、社会学方法论、对宗法社会基本特征的诠释。从翻译与思想互动中剖析严复社会学方面译著,笔者侧重分析原著对严译的影响,译者严复的思想如何投影到译作中,进而探讨两者社会学思想背后的社会、文化语境及社会理念的差距在译作中如何得以体现,以展示其译著宗旨。严复译著西方社会学宗旨包含“对现实的诠释”与“对学理的追求”两个方面。

第三编探讨严复与章太炎在早期的“西方社会学中国化”中各自的贡献。严复与章太炎作为中国近代社会学的开拓者,两者曾就社会学思想展开对话与争鸣,各自利用自己固有的学术优势在早期的“西方社会学中国化”过程中形成了两个路向:严复对“西方事理”的强调和章太炎对“本土经验”的偏重。他们在近代社会学思想建构中创新与守成,为考察近代学术转型提供独特的视角。

严复社会学思想在中国近代社会学体系的建构历程中具有过渡性质,折射了近代学人对相应的时代、社会背景下,对究竟应该建立什么样的政治制度、伦理教化才能科学地完成制度规范、精神规范的重建,两者是相互依附还是必然分离,以及未来社会模式朝什么方向走,这一普遍性社会课题艰辛探索与执著追求的理性之光。

前言

人类对自身的组织结构、功能及其变迁的检视与反思,历史源远流长。就地域而言,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概莫能外。

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已有以探讨社会生活及其问题为主的泛社会思想^①,但尚未形成系统化、专业化的理论形态,谈不上建立专门学科的条件。相比较而言,古希腊、罗马情况有所不同,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的社会思想初具理性思考的价值导向;中世纪的托马斯·阿奎那、马基雅弗利等汲取前人在制度、文化上构建社会体系的诸多成果。这代表日益崛起的市民阶层,结合社会实践,建树新的伦理评判标准及社会政治理念。他们在理论形态上初具规模,对社会变革丰富的感性认识、初步的理论思索,为社会学的诞生准备着思想资源上的材料,在理论架构上也有所酝酿,但总体上尚未形成对社会生活中现象及本质研究的科学理论,也谈不上建立独立而专门的学科体系。

纵观历史,社会思想已有数千年的学术发展历程,至今仍存在。而社会学是社会思想的专业化、学科化的产物。它诞生于19世纪30年代的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造成的贫富冲突的社会语境之中,距今仅有一百多年历史。

① 有一部分学者在文字表达或概念区分上将社会学思想混同社会思想;或认为英国的斯宾塞及法国的孔德创设社会学,而中国的严复的和章太炎关于社会结构、功能的认知属于社会思想。这些观点有待商榷,因为社会思想与社会学思想主要的区别在于有没有形成独立的学科体系。通过对严复、章太炎研究,可见两人已经达到专门化、学科体系的程度,故应该称之为社会学思想。为了避免概念上的纠缠不清,笔者在研究中仍使用“社会思想”这一表达,在有关章节中则使用“社会理念”代替“社会思想”。严复常将 sociology 译成群学,而社会学与群学何者更妥当?群与社会在概念上有何区分?严复在绝大多数场合使用群学,偶然也用社会学。诸如严复在《社会通论》中,称:“群学之家,以社会为有官之大品。”(《社会通论》,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5页)“物体、群体,二者皆有其官司为之翕敛,为之导化,为之保持,又皆有生病老死之可言”。(《社会通论》,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5页)此处群体大体上取“社会”之义。论及“种人乡社二制异同”时,《社会通论》称:“社会学者,翹其同而埋其异,往往坐此见笑于科学之家。”(《社会通论》,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50页)在谈到宗法观念上旧说之谬时,《社会通论》称:“自事实而言之,则社会固先有种而后有族,亦先有族而后有家。其始自无种而为有种,种散而为族,族散而为家,家分而为个人,为小己,则今日文明社会之本位岂置也。此群演自然之至势,而亦社会学新得之秘局也。”(《社会通论》,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17页。)

一、选题意义

社会学作为研究人类社会的组织结构、功能及其发展变化的新兴学科,肇始于西方。19世纪初,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取得突破性进展,人类获得了巨大的征服、改造自然的能力,逐步实现了人对自然的解放;与此同时,生产的发展,致使工具理性对人的主体性产生了严峻的挑战,要求人类革新原有的社会群体组织形式及社会生活的部分内容。至此,在市场作用下,人类开始检视如何才能拓展自身生存及发展的有限空间,由此生发对人与社会关系的重新界定,以求在资本主义社会模式下实现人的自身解放,以便充分地迎接工业文明带来的社会变迁。为了更好地适应社会转型,社会学创始人孔德摒弃早期学者侧重纯社会理论思辨的治学倾向,探索用实证方法探讨社会结构、功能及运作规律。英国学者赫伯特·斯宾塞在领悟达尔文进化论、边沁功利学说等基础上,拓宽了孔德的学科边界,努力地建构综合的社会哲学体系,成为19世纪下半叶西方社会学创始人之一。

西方社会学引导着资本主义社会制度走向完善与发展,而数千年农耕文明下中国未能孕育出缜密的社会理论体系,仍处在社会学前夜,多数学者称之为社会思想。早在1927年,俞颂华在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主办的《社会学界》创刊号上发表《中国晚近社会思想变迁》,称:“所谓社会思想,就是社会多数或智(知)识阶层中一部分有力者所信仰的,而奉为解决社会生活问题的准绳的哲理。”^①据他看来,“把中国自古遗传下来的社会思想分析起来,里面包含的最重要的要素,恐怕莫过于老庄孔孟的学说以及佛教的教理。老庄之学说主无为,任自然,偏于个人主义与无治主义。孔孟反之,重伦理,尚人为,历来一部分有力的士大夫,尊崇道义,同时又不废功利,从事立德立言立功之业,都以孔孟之学说为指归;而以孔孟学说为中心的社会思想,亦因此绵延发达。”^②他还指出:“古来的社会思想是很富于调和性的”,主要表现在:“老庄的学说,并不因为以孔孟学说为中心的社会思想发达而见斥,且其间又有很妙的调和。佛教所以能流传中国,而没有经过激烈的冲突的过程,也就因为佛教教理与老庄学说相接近,能够互相调和”^③。所以“依大体而论,中国古来社会思想之要素是比较上(衍字)简单的,容易调和的。至于社会思想上

① 《社会学界》创刊号,第147页。

② 《社会学界》创刊号,第147页。

③ 《社会学界》创刊号,第147-148页。

所以偏于保守竺旧的缘故,固然因其内容简单,很难推陈出新,但从他方面看来,也未尝不因为以前与中国汉族接触的外族,文化较低,常常同化于汉族,引起了汉族自满自足的心理。此外,因政治上专制之故,思想学说,往往统一于一尊,很难自由发展恐怕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①平心而论,俞颂华说中国古代社会思想的调和性、保守性有笼统、粗糙之处,实际上中国传统社会思想曾为封建社会的繁荣与持续提供有力的理论支撑,其功不可没。但中国封建社会明显早熟,且数经王朝的更替与反复,始终未能走出封建社会的怪圈,也与中国传统社会思想在人与社会关系中由倡导调适功能走向强调教条式地训导,特别强调人与人之间严格的等级性及依附性不无关系。中国传统社会思想,未能形成完备、系统的学科化理论体系,是不争的事实。

随着中西交往的深入,农耕文明下人与人之间等级森严的依附性关系,抵挡不了工业文明倡导的重新审视人的主体性、社会构成的有机体性及社会进化学说所蕴含新的人文精神的冲击。传统社会思想转向社会学,是近代社会转型的必然结果。而救亡图存压力下社会转型因内在与外在因素作用,社会秩序失范。这迫使近代国人检视传统的社会建构方式及运作理念。以严复、章太炎等为代表的近代学人,一方面,着力引进西方社会学,将其本土化;另一方面,从学说思想嬗变的逻辑出发,清理中国传统社会理念,探讨传统社会理念近代化之路。

作为20世纪初中国政坛上反对革命的改良派,学术史上一度以激进而闻名的启蒙思想家严复,对传统社会理念的近代转型及中国气派的社会学体系的构建,这一时代赋予的课题极为关注。他在近代社会学建构中开拓与守成,为我们考察传统社会理念在近代转换提供独特的视角。对严复社会学思想进行研究,有助于我们从严复为代表的时代典型人物身上透视中国传统社会理念被迫向近代转型的历史道路,以及近代国人在“西方社会学中国化”、“传统社会理念近代化”历程中多舛的命运。

二、研究动态述评

严复对近代知识分子的影响,同时代梁启超有着中肯的评价,“时独有侯官严复,先后译赫胥黎《天演论》,斯密亚当《原富》,穆勒约翰《名学》、《群己权界论》,

^① 《社会学界》创刊号,第148页。

孟德斯鸠《法意》、斯宾塞《群学肄言》等数种,皆名著也。虽半属旧籍,去时势颇远,然西洋留学生与本国思想界发生关系者,复其首也。”^①鉴于此,研究严复一直是思想史、学术史的热点,已发表研究严复的论文不下千篇,侧重学术思想的严复评传或其思想评传就有二十左右部^②,严复研究论文及著作大批涌现主要是在2000年以后。

20世纪30年代初,严复社会思想的研究起步。1933年6月,林耀华发表在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编《社会学界》第7卷《严复社会思想》,当属开先河之作。该文至今仍是研究严复社会思想代表作。后人有为数甚少的研究严复社会思想或社会学思想论文,常在理论架构,甚至史料分析、判断上,亦与林文雷同颇多,故将其纲目简介如下:林耀华在简介严复生平之后,简述他的社会思想的学术渊源^③。自第三

① 梁启超撰:《清代学术概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1月第1版,第98页。

② 1933年林耀华发表在《社会学界》第七卷《严复社会思想》,至今仍为精湛之作。也有学者认为“1940年中华书局出版了我国第一部研究严复思想的专著——周振甫先生的《严复思想述评》”。(见刘桂生、林启彦、王宪明编《严复思想新论·序二》第5页注脚,清华大学出版社1999年12月版。)即1940年中华书局出版周振甫的《严复思想述评》(后收入《周振甫文集》第十卷),1957年王栻著《严复传》,1957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1976年新版);1964年Cambridge University出版Benjamin Schwartz著:《In Search of Wealth and Power: Yen Fu and the West》(有叶风美译:《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4月第1版。笔者研究时,基本依据英文原著;另有滕复等译:《严复与西方》,北京,职工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陈越光、陈小雅编《摇篮与墓地:严复的思想和道路》,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出版;张志建著《严复思想研究》1989年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1995年12月,张著改名为《严复学术思想研究》由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出版)、苏中立著《救国·启蒙·启示:严复和中西文化》由东北师范大学1992年版、欧阳哲生著《严复评传》由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徐立亭著《晚清巨人传:严复》由哈尔滨出版社1996年出版、杨正典著《严复评传》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李承贵著《中西文化之会通》由江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冯保善著《中国文化巨人丛书·严复传》由团结出版社1998年版、黄克武著《自由的所以然——严复对约翰·弥尔自由思想的认识与批判》由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5月出版、2000年6月郭良玉著《严复评传》由河南大学出版社出版、马勇著《严复学术思想评传》2001年2月由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出版;侧重严复翻译理论的有高惠群、马传霖著《翻译家严复传论》由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2年出版、沈苏儒著《论信、达、雅:严复翻译理论研究》由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1998年出版;俞政著:《严复著译研究》,苏州大学出版社2003年5月第1版。孙应祥著:《严复年谱》,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8月第1版,在年谱上较为详尽。罗耀九、林平汉、周建昌编:《严复年谱》,鹭江出版社2004年2月第1版,编著详略适当。孙应祥、皮后锋编:《〈严复集〉补编》,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年7月第1版,这是继台湾编的《严复合集》之后,较有成绩的资料汇编。黄瑞霖主编:《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家——严复诞辰150周年纪念论文集》,方志出版社2003年12月第1版。苏中立、涂光久著:《严复思想与近代社会》,中国文史出版社2006年6月第1版。韩江洪著:《严复话语系统与近代中国文化转型》,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10月第1版。皮后锋著:《严复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8月第1版。关于严复研究的论文集及专著还有一些,不一一枚举。

③ 林著指出严复社会思想受19世纪西方社会思潮的影响,主要表现:以达尔文、斯宾塞、赫胥黎为代表的演化论(Evolutionism);以孟德斯鸠、孔德、穆勒约翰为代表的实证论(Positivism);功利论(Utilitarianism);以边沁的功利论及穆勒的《群己权界论》提倡的自由为核心的伦理学;以斯密亚当提倡同富论、马尔萨斯人口论及穆勒功利学说为代表的西方经济自由主义与功利论。见《社会学界》第7卷,第12-19页。

部分起,就中西社会进化之比较,中西国民信仰、法制精神之不同,中国社会问题、政治问题、经济问题,中国之变法图强,教育学说等论述严复社会思想。因篇幅关系,林著在“学说渊源撮要”以后尚有“社会进化之原理”、“国家进化之根本原理”两章,篇末更有“严复影响”一章,发表时均被删去。

林著《严复社会思想》发表时,值日本在中国燃起战火,救亡图存仍是抗战主题,林著字里行间充满炽热的爱国主义情感,对严复的思想褒奖有加,甚至认为严复吸食鸦片的陋习,亦与其怀才不遇、报国无门的失落情绪相联系。

林著从微观的角度考察近代精英人物,并与当下生活里的生存斗争哲学结合起来,令人深思。在治学路径上,林耀华以对宏富的史料排比、分析见长。论点及论证之间的内在逻辑推进颇严密,显示作者深厚的学术功力,正如其学生评价其治学:“传统国学考证方法的传承实践——功能论为外在、国学考证为内在的方法论适应性研究”^①。但林耀华把严复社会思想分专题,排列得太有规则,从中很难看出严复社会思想的发展变化,更难窥探近代社会变革语境下传统的文化人走向近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这一角色转变及其文化意识的嬗变。

林著发表后,用比较方法研究严复社会学思想起步,黄永遵于1937年1月在《社会学研究季刊》1卷3期上发表《清末两位社会学的先锋——严几道与章炳麟》。从1937年2月到1985年1月(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社会学被取消。1979年3月“社会学座谈会”在北京召开,大陆社会学研究得以恢复。)大陆学术刊物研究严复论文虽发表113篇^②,除凤麟在1982年《社会》第1期上发表《严复与他的〈群学肄言〉》(全文2300字左右,列入“社会学人物”一栏)外,无一篇文章冠名或侧重“严复社会思想或社会学思想”。1985年,孙芳明著《清末中国社会学萌芽期:严复社会学译著及社会思想》在《社会》该年度第3、5期刊出,全文约7500字左右,属简介、转述他人论述之作。1995年12月福建省严复研究会编有《93年严复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收有林秋云、苏东福著《严复的社会思想及其社会学译著述评》。港台、海外学者有关这方面专题论文甚少,以许国三在台湾《社会民进》第1卷第3期上发表《严复社会思想》为代表。

自1922年严复去世至今,较系统地涉及严复社会学思想的专著有:美国 Ben-

① 庄孔韶:《林耀华早期学术作品之思路转换》,见林耀华著《义序的宗族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6月第1版,第275页。

② 张志建著《严复学术思想研究》,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1995年12月第1版,第340-348页中论文统计部分。

jamin Schwartz 著 *In Search of Wealth and Power: Yen Fu and the West* (《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杨正典著《严复评传》等。从个人与社会关系探讨严复自由理念有台湾黄克武著《自由所以然——严复对约翰·弥尔自由思想的认识与批判》。部分社会学通史或断代史涉及这方面的有:王康主编《社会学史》,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袁方主编《社会学百年》,1999年北京出版社版;杨雅彬著《近代中国社会学》,2001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版,姚纯安著《社会学在近代中国的进程(1895-1919)》,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3月第1版,该书原为中山大学历史系2003届中国近现代史方向博士学位论文,分为三章,即1895-1903年为西方社会学的输入;1903-1911年为思潮激荡的社会学;1911-1919年为社会研究视野中的社会学。能否这样分期可以讨论。书中有篇幅涉及严复社会学思想。

海外的史华兹和黄克武因其理论视角与分析框架有别于传统思想史的写法,且黄克武试图在史华兹研究基础上有所突破,故受学界关注,现略作评析。

史华兹认为:严复在近代中国宣布了一个让人震惊的基本命题即西方强大的根本(也即造成中、西不同)不仅在器物层面、制度层面,而且在于中、西对现实的视角是如此的不同,这就决定须从思想领域探寻中国近代的屈辱。经宏观分析后,史华兹提出:“追根溯源,我们发现严复所有认识与观点,都和斯宾塞理论体系的分支密切相连:一元论性质、类似泛神论的自然主义;把宇宙视作永不会枯竭的力与能量源泉,这种力与能量总是蕴含在复杂多变的事物结构之中;经斯宾塞阐释的达尔文‘机械’进化论;对社会功能作生物学的类比;对自由主义价值理念的诠释。所有这些皆有斯宾塞式的灵感。”^①在史华兹看来,严复视角独特处缘于他“通过英国看斯宾塞,通过斯宾塞看英国。”^②通过斯宾塞著述及英国留学经历,严复认识到英国人的生活彰显了西方式的“公心”。^③“西方奇迹(特别是英国)在于其促进私人利益的建构能力,释放个人能量,汇聚这些能量,达到集体的目的。”^④

史华兹关于严复的论述,体现了20世纪60-70年代海外汉学研究由“传统——近代”两分模式向“在中国自身寻找内在的学术发展逻辑”方向的转变。这

① Benjamin Schwartz; *In Search of Wealth and Power: Yen Fu and the West*, 1964, Cambridge University; second printing, 1979, P69.

② Benjamin Schwartz; *In Search of Wealth and Power: Yen Fu and the West*, 1964, Cambridge University; second printing, 1979, P69.

③ Benjamin Schwartz; *In Search of Wealth and Power: Yen Fu and the West*, 1964, Cambridge University; second printing, 1979, P70.

④ Benjamin Schwartz; *In Search of Wealth and Power: Yen Fu and the West*, 1964, Cambridge University; second printing, 1979, P70.

一点可从史华兹本人论叙中得以展现:“前面的研究已经展现严复的思想体系,不能截然地分为‘传统’与‘现代’两个毫不相干的层面。”^①从洞悉史华兹思想基调的西方评论家论述中也可可见一斑,路易斯·哈茨(Louis Hartz)在《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序言中指出:“因为有自己的文化作参照,外国的评论者常能明智地揭示自己所研究的国家社会生活中思想底蕴……史华兹教授在这部著作中向大家介绍将西方思想作整体性考察的研究者严复……严复立足于尚未经历近代化变革的中国文化这一纬度上,抓住欧洲文化经典表述的‘集体力量’这一要害。严复认为……‘集体力量’体现了欧洲走向近代化的历程。”^②“在欧洲思想谱系中,严复至少发现欧洲富强缘于两个方面,在严复看来这两个方面是中国走出落后状态必不可少的。一要充分发掘人的全部能量,二要培养那种将个人能量引向为集体利益而服务的大众精神。显然,通过欧洲思想家们明晰地阐释,上述思想很均匀地散布、记录、浓缩在这些经典著作里。”^③史华兹的分析框架基于严复的6部译作(包括《政治讲义》,严复有9部译著)分析,并将《群学肄言》、《支那教案论》穿插在有关章节讨论。这和黄克武抽取严复所译穆勒的《群己权界论》,与原著 *On Liberty* (《论自由》) 进行比照,再结合严复的心路历程看弥尔(又译作穆勒)主义对其政治思想影响,是两个治学路子。

黄克武著《自由的所以然》,认为严复的自由主义表现以下的特点:追求富强;肯定自由、民主与资本主义,但拒绝“己重群轻”的个人主义,并强调“己群并重”;调适性的渐进改革。三者构成高度整合性的政治理论。

《自由的所以然》中有可商兑之处。

其一、关于乐观主义与悲观主义。在黄克武看来,弥尔的“人类的智性根本上是不可靠”观念,以及他所坚持的容忍异议者态度,都和他对知识特殊的看法密切相关。^④由此,弥尔对知识的看法显然带有怀疑主义(skepticism)色彩。

① Benjamin Schwartz: *In Search of Wealth and Power: Yen Fu and the West*, 1964, Cambridge University; second printing, 1979, P196.

② Louis Hartz: *Introduction*, seeing Benjamin Schwartz: *In Search of Wealth and Power: Yen Fu and the West*, 1964, Cambridge University; second printing, 1979, Pxi.

③ Louis Hartz: *Introduction*, seeing Benjamin Schwartz: *In Search of Wealth and Power: Yen Fu and the West*, 1964, Cambridge University; second printing, 1979, Pxi.

④ 黄克武:《导论》,见《自由的所以然——严复对约翰·弥尔自由思想的认识与批判》,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5月第1版,第15-17页。

黄克武将认识论作为切入问题的重心^①。他对墨子刻的悲观主义与乐观主义理论进行阐释：“墨子刻进一步地将怀疑主义与中国思想相比较，而提出了一个很有启发意义的区别，即‘悲观主义的认识论’与‘乐观主义的认识论’。”^②墨子刻所谓认识论上的乐观与悲观，就是在描述人们对于获得知识所持有的态度。悲观主义的认识论指涉要获得客观的知识是非常困难，即古语所谓“理不易明”，乐观主义的认识论则认为这样的工作不成问题。换言之，前者强调人类智性的不可靠，后者则凸现真理的明显性^③。

黄克武认为，弥尔主义与严复对弥尔主义本身之认识，存在差距，“严复受到从儒家传统与道家传统而来的思想模式之影响，所以他对弥尔主义的‘再呈现’与它的传统背景，如乐观主义的认识论之倾向与群己平衡之观念，是交融互释的，而两者之间又互有关联。从认识论的方面来看，因为严复缺乏弥尔那样悲观主义认识论的倾向，使他对于社会规范的客观性与明显性有较强的信念，也担心自由观念的引介会导致道德混乱的局面”^④等。黄克武一再强调，严复以乐观主义认识论中对“真理”或“正道大法”的乐观想法来翻译弥尔，结果使他只看到弥尔思想中乐观主义的一面，而忽略或误会弥尔思想中以悲观主义认识论为基础的推理。

黄克武称弥尔思想中“悲观主义的认识论”之倾向，以及与此密切相关的“人类的智性根本上是不可靠”的主张并没有让严复留下深刻的印象，他受到儒家传统的“乐观主义的认识论”之影响，对获取知识的可能性有较强的信心^⑤。

笔者以为上述论述值得商兑。就认识论而言，儒家创始人孔子主张“礼”、“仁”并重，这当中已有人性“善”、“恶”对峙的端倪。孔子之后，儒家思想分为两派：一派以孟子的“性善论”为代表，主张施行仁政，是“王道”的基础，乐观主义的先导；另一派是荀子的“性恶论”，主张“隆礼重法”并举，是悲观主义的先声。其后，儒家建构在“性本善”或“性本恶”基础上的人性论，就“乐观主义”或“悲观主义”

① 黄克武：《自序》，见《自由的所以然——严复对约翰·弥尔自由思想的认识与批判》，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5月第1版，第x页。

② 黄克武：《导论》，见《自由的所以然——严复对约翰·弥尔自由思想的认识与批判》，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5月第1版，第18页。

③ 黄克武：《导论》，见《自由的所以然——严复对约翰·弥尔自由思想的认识与批判》，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5月第1版，第19页。

④ 黄克武：《导论》，见《自由的所以然——严复对约翰·弥尔自由思想的认识与批判》，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5月第1版，第44页。

⑤ 黄克武：《导论》，见《自由的所以然——严复对约翰·弥尔自由思想的认识与批判》，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5月第1版，第4-5页。

义”价值取向展开激烈争辩,未有定局。由此看来,黄克武称严复受儒家乐观主义影响值得商榷。实际上,一个人的思想是发展变化的,有时乐观,有时悲观。在近代救亡图存的强烈民族忧患意识作用下,严复有些作品悲观主义倾向占主流。

再看原著。*On Liberty*(《论自由》)是穆勒与妻子共同作品。1851年,穆勒和思念多年的哈里特·哈迪(原为泰勒夫人)结婚。泰勒夫人是个坚强的女性,充满着乐观主义人文精神,在学术建树上向持客观、公正立场。1856-1858年,两人开始构思、拟定写作框架,“经过象往常一般写了两遍以后,……读了一遍又一遍,字斟句酌,修改每一句文字。我们原打算在1858-1859年冬季,也是我退休以后在南欧度过的第一个冬季最后定稿。这个希望连同其它所有希望统统被意想不到的我妻子逝世带来的灾难化为泡影。”^①“这本论著中很大一部分是我亡妻写的,我以此奉献给她,作为对她的纪念。”^②妻子死后,穆勒确实备尝艰辛与磨难,一度有悲观主义的倾向,但这对《论自由》影响不大。一方面,此书的理论框架已经定型;另一方面,穆勒深受其妻子学术立场上的客观主义影响。穆勒自己也说:“此书表达的整个思想方式显然全是她的,但是我彻底受到此种思想方式的浸染,因而我们两人自然而然产生同样的思想方式。”^③妻子对他的帮助主要是避免思想偏见的误导,尽可能站在比较客观的立场上看问题,“在我思想发展过程中,有过一段时间在社会和政治主张上极可能陷入不要政府的倾向,在另一段时间又有可能趋向另一极端,即不象现在这样强调彻底的激进与民主。在这两方面以及在许多其它问题上,她不但引导我认识新的真理,摆脱错误,而且帮助我站在不偏不倚的地方……她对的思想发展最有价值的地方在于她能恰当地衡量各种见解的相对重要性,从而使我不至于见到一种新的道理,就使它在我的思想中占有超过其应得的重要地位。”^④对此,严复洞察明晰,他将“穆勒自序”^⑤部分文字译成:“以伉俪而兼师友,

① [英]约翰·穆勒著、吴良健、吴衡康译:《约翰·穆勒自传》,商务印书馆1987年2月第1版,第146页

② [英]约翰·穆勒著、吴良健、吴衡康译:《约翰·穆勒自传》,商务印书馆1987年2月第1版,第146页

③ [英]约翰·穆勒著、吴良健、吴衡康译:《约翰·穆勒自传》,商务印书馆1987年2月第1版,第147页

④ [英]约翰·穆勒著、吴良健、吴衡康译:《约翰·穆勒自传》,商务印书馆1987年2月第1版,第147页

⑤ “To the beloved and deplored memory of her who was the inspirer, and in part the author, of all that is best in my writings—the friend and wife whose exalted sense of truth and right was my strongest incitement, and whose approbation was my chief reward—I dedicate this volume.” John Stuart Mill: *On Liberty*, London: John W. Parker and Son, Wtrand. M. DCCC. LIX, First published in 1859. P58.